**论陶渊明文化地位演变——从后世文本阐释角度出发**

**摘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天才”。历史总是如出一辙，却也有特例。陶渊明就是这少数特例中的一个。作为被历史挑选出的一个幸运儿， 陶潜的诗文作品虽然生前不得伯乐赏识，身后却经受住了时光的淘洗并走进人们的视线。在后世乐此不疲的文本阐释和修订中，陶渊明演变成一位文学巨人，甚至成为华夏文明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偶像。这不仅仅是陶渊明本人的幸运，更是整个东亚文化界的幸事。

**关键词：陶渊明；文本阐释与修订；文化偶像**

1. **陶渊明的符号性演变**

陶渊明文化身份的演绎是复杂而漫长的，可大致分为在世时，刚逝世到隋唐前期，以及隋唐至今漫长的千年光阴。他本人在世时，做过的都是芝麻小官，比如州祭酒、彭泽令之类，官场上可以说是很不得意。其内隐的刚直忤世之个性又不容许他像前代名士嵇康、阮籍那样如此愤世嫉俗，无奈只能解甲归田。因此陶渊明在世时，如果作为一个符号化的存在，估计是可有可无的，在当时世人眼里，或许就是一个失败的避世者形象，其诗文寡淡到以至于连个诗人都称不上，已然沦为众人。

在他逝世后不久，颜廷之、沈约等人的评论大都强调其志节，而忽视其文采，使陶渊明的文化符号固定在一个忠义孝廉的局促范围内。而后不久，梁著名诗论家锺嵘在《宋征君陶潜诗》中赞誉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1]](#footnote-0)陶渊明似乎首次明确以隐逸诗人的身份出现在他人的论述中。虽然锺嵘对陶潜诗文文学价值的认识拘囿于当时“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2]](#footnote-1)的审美取向，将陶诗列为“中品”而颇受后世诗人、评论家诟病，但相比于之前而言，后世对陶渊明的认识已经开始逐渐趋于客观，陶作品的艺术价值逐渐得到以萧统为代表的诗论家的认可。

进入隋唐时期，陶渊明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愈发地活色生香、丰富多彩起来。有人从封建制度入手，将陶渊明对于晋代的念念不忘、忠心耿耿不断放大，以满足封建社会巩固现有王朝统治的需要；有人从社会角度入手，论陶者竭力把陶说成是“人民的肖子”[[3]](#footnote-2)，力求将陶诗中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惺惺相惜和深刻同情剖解出来，塑造一个有深刻忧世忧民情怀的陶的形象；有人从伦理道德入手，盛赞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从而为后世知识分子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树立榜样；也有人从审美价值的角度立论，“或称道他那质而实绮、枯而实腴的诗风，或激赏他所创造的那种和谐静穆的诗境，或沉醉于他诗文那平淡自然而又韵味浓厚的艺术魅力”[[4]](#footnote-3)。总之，陶渊明在其身后被贴上了无数标签，被寄予了太多的揣测和评判，随便哪个不得志的诗人在感慨自己怀才不遇、向往归隐田园的时候都要拉出一个五柳先生以衬己志。然而正是这些后人的墨水勾勒了陶渊明的基本形象，为陶成为后世文化偶像奠定了极深厚的文本基础。陶潜本人只留下一百多篇作品，而后人对其人其文所做的分析评述却早已浩如烟海。不知不觉中，陶渊明已经不可避免地被符号化，“隐逸诗人之宗”“田园”“饮酒”“无弦琴”“菊花”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中的意象也随陶渊明一起被抽象成某种象征性的符号，并永远与陶捆绑在了一起，这或许是对陶渊明一厢情愿的刻板印象，但却也实在是成全了他在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中独一无二、极具个性的文化偶像地位。

1. **陶渊明作品的延展性和代表性**

后代诗人对陶渊明的追捧和喜爱可谓愈演愈烈。那么问得通俗点，陶渊明究竟为什么能火起来？为什么后人心甘情愿一口气给陶渊明打了近两千年广告？其实这就跟现在导演、制片人想要捧红某个演员、做大某个娱乐节目的道理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要和受众群体有共通性，利用同情心和同理效应逐渐达到关注沸点。这一点陶本人可能并未发觉，然而他本人的浓烈文人气质，那出身名门的身世，丧妻、退官、隐居的人生经历，矛盾于入世出世之间等等这些特质，都实在太符合后世知识分子对理想诗人的人物设定，并且陶渊明作品本身富有的弹性为后代不断的挖掘外延提供空间。我们只要泛泛翻阅后世诗文，就会发现李白最爱和他喝酒畅谈，王维最乐伴他闲居田园，苏轼最喜与他论琴修道。还有无数的二三流小诗人循着他的足迹， 在其作品中热情歌咏他的桃花源，赞颂五柳先生之随性，感怀归去来兮的潇洒，这股尊崇之风甚至刮到了王国维、鲁迅等人的笔端，刮到当今中小学生的课本里。文人普遍习惯凡事映射自己，像陶这样一位喜欢喝喝小酒、弹弹小曲，躬耕田园、蔑视权贵且“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田园诗人，简直是历来文人心中最符合他们理想形象的人设，自然不能错过这样绝佳的人物素材来大肆浸染。

除了陶渊明浓烈的文人性，其对于宇宙、人生、社会的思考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点。陈寅恪先生认为陶渊明是不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而且“实为吾国中国时代之大思想家”。形成陶独特人生态度和生命境界的文化底蕴丰富而复杂，他早年熟读儒家经典，又受外祖父孟嘉的冲淡平和处事风格的影响，这种成长背景使他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儒、释、道之间左右踟蹰。[[5]](#footnote-4)后世对于陶的思想体系一直争论不休，他到底是归儒还是归道，思想家和文学史家一直在打笔墨官司。这不经意间流露的精幽微深的哲学思考，引起了后代知识分子的热情讨论。有人认为“渊明所说者庄、老”，“陶公所以不得与于传道之统者，堕庄、老也”，“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6]](#footnote-5)；有人则认为“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汉人以下，宋儒之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7]](#footnote-6)；有人说他“实外儒而内道”，又有人说他“实内儒而外道”……诸如此类的辩论数不胜数，而就是在这样的抗辩中，陶渊明儒道兼具的一面被剖析出来，使之承载了厚重磅礴的中华文化，成长为经久不衰、魅力不减的文化偶像。

**三．“好事者”的“添油加醋”**

陶渊明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偶像，除了陶同志本人争气（其作品丰富的内涵、外延性、代表性）之外，还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那些热衷于捧红他的人。古代文人一旦执意要做一件事那就可以说是一门心思地对待，更何况是当在诗歌世界里遇到了认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相遇的知己时，那就更是得掏心窝子地借助自己的诗文和影响力为偶像正名了。陶渊明能成为文化偶像和后人不断的宣传评述，以及对其诗文的整理、编纂是密不可分的。文人们把陶渊明的诗文作品逐字逐句地剖析并进行考证，给予其作品极高的评价。尤其是苏轼，“他对陶渊明其人其诗有精微体悟并做出了深刻阐释，不仅把陶的诗文视为艺术的极致，也将陶的为人作为自己人生的楷模；对其诗心追手效，首首依韵而和，对其人更是高山仰止”[[8]](#footnote-7)，喟叹道“我不如陶生”。文学大家对陶渊明的崇拜使世人对其的看法也更加带有崇敬色彩。自称“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的萧统，早对他“脱颖不群，任真自得”的为人钦仰不已。苏轼认为他在诗史上的地位“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9]](#footnote-8)。理学大师朱熹也极口称赞他不“局促尘埃”的存在方式：“作诗须从陶、柳门中来乃佳耳。盖不如是，不足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也。”[[10]](#footnote-9)王国维也说“屈子之后，文学上雄者，渊明其尤也”[[11]](#footnote-10)。到现代的一批作家，例如朱光潜先生仍然认为：“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12]](#footnote-11)历朝历代评论家和大诗人对陶诗的肯定和推崇，将陶渊明的文化地位逐步推向了可以屈原、杜甫比肩的高度。

**四、结语**

我们不得不承认，论陶者们很多时候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意志，对陶渊明也有过分曲解的嫌疑。例如，欧阳修和苏东坡越到自己的人生后期，越是把陶渊明这个人的意义提炼为“闲适”[[13]](#footnote-12)。但实际情况是，陶渊明在世时经济拮据，遇到灾荒歉收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还要拖家带口养育五子。可以说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劳碌和困顿的，他那份难得的闲情被自己一股脑地倾泻在了诗文中，而又一味地被无数的知识分子和读书人放大了。这种放大并不难理解。文学之于文人大概也有点自欺欺人的作用。陶渊明将向往中的田园生活发于笔端，对他本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欣慰和难得的解脱；在后世不得意者眼中，更是有文字可循的、文学世界里的大榜样，将陶潜看成了一种“补偿性和指标性的人物”[[14]](#footnote-13)

陶渊明文化地位的演变实在是一起很有趣的文学现象。历史用漫长岁月为陶渊明“翻了冤案”，其身前官场的落魄和文化圈子的不得意，终于以逝后的“千秋万古名”得到了补偿。五柳先生若身后有灵，也该感欣慰。

1. 锺嵘：《诗品》卷中，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60页。 [↑](#footnote-ref-0)
2. 萧统：《文选序》，《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2页 [↑](#footnote-ref-1)
3. 《澄明之境 陶渊明新论》 戴建业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footnote-ref-2)
4. 《澄明之境 陶渊明新论》第2页 [↑](#footnote-ref-3)
5.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5页 [↑](#footnote-ref-4)
6. 朱自清：《陶诗的深度》，《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69页 [↑](#footnote-ref-5)
7. 沈德潜：《古诗源》卷九，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4页 [↑](#footnote-ref-6)
8. 戴建业，《澄明之境 陶渊明新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footnote-ref-7)
9. 苏轼：《与子由书》，《苏轼文集》第六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15页 [↑](#footnote-ref-8)
10. 朱熹语，引自陶澎集注《靖节先生集 诸本评陶汇集》，《四部备要本》 [↑](#footnote-ref-9)
11. 王国维：《文学小言》，《人间词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footnote-ref-10)
12. 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7页 [↑](#footnote-ref-11)
13. 张祎，《陶渊明的遗产》，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89页 [↑](#footnote-ref-12)
14. 张祎，《陶渊明的遗产》，第391页 [↑](#footnote-ref-13)